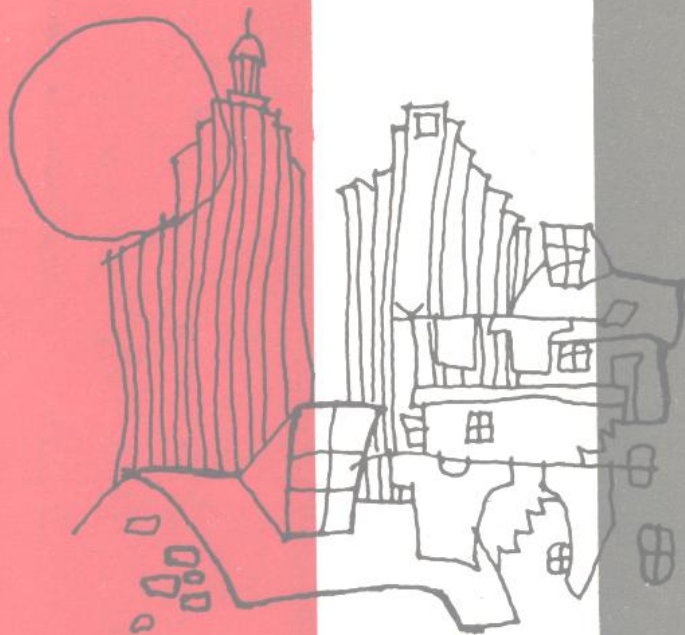


三十年代

在上海的“左联”
作家



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编

上海
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

· 上卷 ·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六五”期间重点项目

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

(上 卷)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序

贾植芳

三十年代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被史家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光辉的一页。事实也正是这样。因为它标志着“五四”建立的新文化大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和素质的提高与改造，它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处于承先启后的历史地位。这个以鲁迅为旗手、以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核心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学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所建成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社团的文学活动，它具有自己明确的理论纲领和组织原则，它团结了当时信仰或同情共产主义的广大作家群和文学青年，把“五四”所开创的以反帝反封建为标帜的新文学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它的广大成员，紧跟中国人民的革命步伐，在它的领导下，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配合革命根据地的反蒋介石国民党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在文化战线上，取得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文化“围剿”的伟大胜利。它在传播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文艺创作、翻译介绍外国革命文学理论和作品、团结进步作家、建立与世界革命和进步作家的联系和友谊、培养文艺新军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它的不少优秀成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它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历史教训。它的影响深远，历久不衰。它的基本成员和在它的教育

下成长的文学青年，在以后半个世纪以来，无论在解放前的发展我国革命文学运动斗争中或在解放后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建设事业中，仍然起着主要的领导和骨干力量的作用。

对于这个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运动或文学社团的研究和评论，建国以后，虽然著述很多，但由于“左”的干扰，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历次掀起的文艺界的政治运动，又多半是以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参加者和影响者为 主要对象（由1955年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57年的对“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的批判，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又由批判所谓“四条汉子”到“彻底砸烂”“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这就必然使我们评论界对这个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息息相关的文艺运动或社团的研究和评价，长期陷于发疟疾似的摇摆多变状态，只是在历史的上空里，留下一片喧嚣混乱的噪音，徒然使读者处于茫然费解和无所适从的困境。这个新的历史教训，性质是严峻的，因此也是宝贵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们国家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从对给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学繁荣带来莫大灾害的“左”的危害的惊醒中，经过一系列拨乱反正的努力，平反改正了文艺界的大小冤假错案，从而解放了文艺生产力，也给完全陷入绝境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对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带来了生机和起色。几年内，我们先后出版了《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汇编》（马良春、张大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左联回忆录》（上、下二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以及为数众多的有关作家的研究资料专集、作家的个人回忆录等史料性著作。这是随着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回到学术界后，出现的一种新气象，我们开始注重从文献史料的收集、发掘、整理和鉴别着手，为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实基础之上，作出了认真的努力，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一事实充

分说明了资料建设是学术建设或学科建设的最基本的工作这一道理，是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之根本之途。值得大书特书。同时，读者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的要求，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历史的反思，促使我们开始摆脱了把学术研究工作等同于政治斗争工具的老套旧习，在充分肯定研究对象本身的独特价值的认识前提下，力求把学术研究真正纳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轨道，尊重科学研究自身独立价值的新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成为新时代的学术标帜。

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结集所内外三十五位专业同志的力量，合作编写的这部《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便是从一个新的认识角度，把对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的专著。历史的主体是人，人创造历史，历史又创造了人。每个历史运动和事件，都离不开人的因素。因此，从人物角度观察和研究历史运动现象，通过对历史人物事迹的描绘，认识一个时代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应该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和途径。这部新著《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左联”作家》，就是一部以人物为题材，通过对三十年代生活和战斗在上海的六十七位“左联”盟员的历史生涯的描述，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社会面貌和文坛风云的传记体著作。作为一个战斗的革命集体或文学社团，这里收录的对象，既有党的领导干部、联盟的主持者，也有首批盟员和从1930年3月至1935年底入盟的成员；既有始终忠于自己的历史性选择的坚定的革命作家，也有个别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走入他途的人物（象杜衡、杨邨人，谢冰莹等这些人），这就充分体现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完整性，达到了把历史研究作为认识手段的目的。而前些年来，我们却总是惯于用感情的色彩，从一时的政治风色出发，把历史研究作为单纯的宣传手段来运用，集中于歌颂甚至拔高正面人物，对于历史上的反面角色，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对象，取不屑一顾的否定其存在的鄙夷态度；而

且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种所谓“有问题”的人物越揪越多，研究工作也就越来越少用武之地，以至历史这面清如水的镜子，被涂抹得模糊不堪，面目日非。在眼前的这部新著中，作者们尊重历史，客观的审视历史的治学态度，却克服了积弊，充分体现了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必然为它在学术界取得应有的存在价值和学术地位。

另外，我对于本书的选题眼光，也十分钦佩。因为众所周知，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文化出版中心，这里既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策源地和领导中心、进步作家的驰骋场所，也是鼓吹民族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文探特务猖狂肆虐、行凶作恶的地方，各种资产阶级文学流派，也都把上海作为安营扎寨的福地。因此，通过对“左联”成员个人事迹的描述和分析，实际上就是掌握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抓住了历史运动的中枢神经，既深入又具体，又生动又实际。这六十七位“左联”盟员个人生活经历和活动内容——他们在文艺创作上的成败得失，翻译介绍苏联和其它国家的革命文学理论与作品的情况，他们在传播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过程中，和其它文学社团流派（包括国民党反动派的御用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和其它资产阶级文学流派——新月派、“自由人”、“第三种人”、论语派等）的斗争和论争，他们的编辑出版活动，政治社会斗争，以及从他们的交游中所反映的当时各种复杂的社会和文坛的人际关系等等，实际上集中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历史全貌，而从作者们笔下所写的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成长过程，历史特点的认识和分析中，又使我们充分体味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特点，它的前进势头，这对于提高我们对历史的洞察力，也应该是一种很有益处的帮助。

总的说来，我觉得这部新著的最大价值和意义所在，就在于作者们能从尊重历史真实的认识出发，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在

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来观察和品评这个文学运动或社团的历史意义的同时，又力图从新的时代高度，结合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建国以后在建立社会主义文学工程过程中的丰富的历史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教训，以新的思想水平，重新审视和把握这个历史时期的全部内容，努力进行新的认识和发掘，从这些创造历史的人物所参与的那个历史过程和事件以及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中，提示这段文学历史实践对我们今天现实所能提供的实际意义和真正认识价值，它的丰富的历史和思想涵意，从而使我们在创造“历史”的前境中，在提高对自己事业的正义性的认识 and 信心的同时，头脑更加清醒些，更富有理性思维能力。因此，我觉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新著，不但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深刻的指导现实的意义。通过这部新著，前人们用他们的劳动和智慧以至鲜血和生命所创造和积累的这笔历史财富才真正成为我们自己手中的运用自如的财富，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中，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和效益。

正是由于这点肤浅的认识体会，我乐意向读者社会推荐这本书，并愿以此文求教于海内外贤达。

1987年2月中旬在复旦大学

目 录

(上 卷)

序.....	贾植芳 (1)
鲁 迅.....	正 一 (1)
瞿秋白.....	朱 正 (32)
潘汉年.....	陈子善 (50)
冯乃超.....	陈青生 (62)
夏 衍.....	王文英 (78)
阿 英.....	王文英 (95)
郑伯奇.....	陈青生 (114)
洪灵菲.....	胡从经 (131)
蒋光慈.....	胡从经 (151)
冯雪峰.....	包子衍 (169)
柔 石.....	胡从经 (186)
阳翰笙.....	张向华 (206)
戴平万.....	饶芃子 黄仲文 (220)
田 汉.....	张向华 (229)
孟 超.....	卢正言 (248)
李伟森.....	胡从经 (260)
殷 夫.....	胡从经 (273)
冯 铿.....	胡从经 (291)

冯宪章.....	胡从经 (308)
王任叔.....	陈梦熊 (318)
刘一梦.....	胡从经 (333)
柯仲平.....	周 健 (340)
石凌鹤.....	王向民 (358)
郁达夫.....	王自立 (369)
白 薇.....	王文英 (384)
杨 骚.....	钦 鸿 (401)
戴望舒.....	应国靖 (414)
杜 衡.....	应国靖 (425)
魏金枝.....	王尔龄 (433)
彭家煌.....	胡从经 (444)
洪 深.....	王文英 (462)

鲁 迅

正 一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六年，鲁迅在上海度过了人称后期的十年。这是左翼文学运动发轫和展开的十年，也是他生命之火燃烧得最炽烈，战斗业绩最辉煌和文化成就最丰硕的十年。这期间他作为共产主义的战士，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和生活上，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的特点。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只是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①就鲁迅而言，“将来”既反映他一贯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社会理想和革命信念，又始终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早年留日时期，他的《破恶声论》抨击了清末士大夫的种种谬论，认为“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但同时表示“吾未绝大冀于方来”。这“方来”或将来，便是《文化偏

^① 鲁迅：《〈三闲集〉序言》、《〈二心集〉序言》。

至论》提出的“人国”，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民主主义理想。“五四”前夜，他揭示几千年旧中国的历史乃一部鲜血淋漓的“吃人”史，但同时断言“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将来”则是“人国”蓝图的充实和发展，是他经历辛亥革命失败导致的“颓唐”，又因十月革命影响激起思想“变迁”，从而发展了的彻底革命民主主义理想信念的表述；较之早年，更富现实性、深刻性和战斗力。“五四”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的新文化运动相对低潮时期，他不仅“荷戟独彷徨”，坚持思想文化战线的战斗，并且“上下而求索”，坚持“指南针”的追求，因此使世界观中马克思主义成分迅速增长，进化论基础大为削弱，乃至在一九二七年春的广州，在陈延年为首的中共广东区委的促进帮助之下，首先完成革命小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的转变，继而更由于蒋介石反革命大屠杀的“事实的教训”，“轰毁”即扬弃作为哲学基础的进化论，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就是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和革命信念。

一九二七年十月，他从广州前来上海。还在留穗期间以及抵沪之初，共产主义者鲁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本着新的理想信念自觉地维护已遭严重挫折的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揭露批判反革命政变和国民党当局。他认为反革命政变的得逞，必然招致中国的进一步殖民地化，“此后是洋人和军阀联合的吮吸，各处将和香港一样，或更甚的”。但是，黑云压城城不摧，“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①这“大时代”乃经非“死”即“生”的激烈斗争，通往“无产者才有将来”的革命高涨时代。——“彷徨”式苦闷岁月一去不复返了，立足黑暗的现实，瞩望光明的未来，鲁迅在上海的战斗，一开始就紧紧围绕着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然而，关于革命文学运动问题的论争，使鲁迅面临来自革命

^① 鲁迅：《“行路难”按语》、《铲共大观》、《〈尘影〉题辞》。

阵营内部的挑战。原先抵沪不久，他曾本着初衷，准备同创造社联合起来，在新形势下开展文艺运动，经过磋商，已就《创造周报》的“复活”登出了联名广告。可是，创造社由于新分子的加入和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忽然对鲁迅，对茅盾、叶圣陶、瞿作人以至前期创造社的郁达夫，都进行指责和攻击。鲁迅不以为然，给予讽刺和反驳。于是，论争便伴随着对他逐步升级的攻击而展开。事实上，可供选择的態度有三：或默认包括“封建余孽”“法西斯蒂”和“双重反革命”在内的罪名，或表白自己不仅一贯革命，且已经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但这两者都与他的性格不符，他惟有以惯用的讽刺态度来参加论争，接受挑战。《三闲集》的有关文字表明，鲁迅是原则上支持革命文学运动的。然而，他反对唯我独革的“左”倾思潮和宗派主义的“互相标榜，或互相排斥”，也反对脱离实际的搬弄马克思主义教条，要求正视并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暴力”。他主张切实地先将“精密的”和“简单浅显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翻译过来，并引进“反对的著作”，供读者学习、比较和鉴别。依据存在决定意识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他指出，在阶级社会，文学艺术“都带着阶级性”，但不是“只有”而乃“都带”，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勃兴的产物，应该成为这个阶级“最高的政治斗争的一翼”，但文艺毕竟自有其规律，革命文学“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述”，防止与革命的“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等政治宣传品混同起来。他认为，是否革命文学的根本问题不在“标榜”，而在作者“其人”是否真正革命，——亦即论战前不久他关于“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的论断的重申。诚然，鲁迅的观点并非字字真言，如他自己所说，也有“错的”，但是，他不仅不反对革命文学本身——更不必说“反革命”，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发表了许多独到见解，通过论争，同攻击他的创造社和太阳社一起，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建设，作出了贡献。

为左翼文学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鲁迅深刻了解本国国情，善于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跟“劳农专政”的社会主义苏联区别开来。因此他的理论见解，更切合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猖獗、革命处于低潮的严峻现实，能够不受“左”倾思潮的影响，从实际出发而避免教条主义偏向。这个思想理论上的特色，在整个文化界马克思主义水平尚低，左翼文学运动尚处发端阶段的二十年代末，非常可贵。第二个特色，是鲁迅不以“无产阶级”自诩，恰恰相反，论战初他自称“小资产阶级”，后来凡涉及个人的阶级归属问题，仍然划自己为“小资产阶级”或“中产的智识阶级”。这种思想政治上的严格态度，跟理论上的进一步追求是互为表里的。论战初期的一九二八年六月，他便已率先行动，译出了《苏联的文艺政策》和《苏维埃联邦从马克西姆·高尔基期待着什么？》，随后更分别完成包括卢那察尔斯基和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在内的一批著作的翻译，为有待展开的左翼文艺运动提供理论借鉴，并用以“煮自己的肉”。第三个特色，是在内部论争期间，他既不放松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共屠杀政策，又不要忘记维护共产党和革命利益，理论付诸实践，将自己的笔服务于无产阶级“最高的政治斗争”，但决非机械论或目光短浅的某种生硬配合，而是牢牢地立足现实，密切地联系“大时代”的到来。

党的正确干与，制住了对于鲁迅等人的错误攻击，并且推动论战各方团结起来，经过酝酿、筹备和清算论战中出现的“左”倾偏向，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由鲁迅、冯乃超、夏衍、柔石、雪峰、郑伯奇、钱杏邨等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绚丽夺目的一页，信仰或者同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学家们有了自己的革命文学团体。具有革命理论纲领和明确组织原则的“左联”，跟随后成立的其它左翼文艺团体和社会科学团体一道，共同显示出“五四”文化新军的发展壮大和队

伍素质的提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单独领导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对于革命文化事业的领导的加强。

“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指出左翼作家必须了解“革命的实际情形”，“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不可“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否则貌似“激烈”“彻底”，“左”，却“最容易‘右倾’”，“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鲁迅告诫说，“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建设却是麻烦的事”，不可抱幼稚的“浪漫谛克的幻想”，否则，也就会“撞碎了”。鲁迅要求“左联”充分注意，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这就是他历来提倡的韧性战斗精神；第二，“左联”的“联合战线”“应该扩大”，尤其是“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提高战士的思想理论水平，包括“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第三，成员们必须团结统一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上，不能“只为了小团体，或者其实只为了个人”，而应当“目的都在工农大众”即革命利益。——鲁迅的演说，实际上是“左联”纲领的深刻发挥和必要补充。当天大会通过的“理论纲领”写道：“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而鲁迅所说关于联系社会的实际斗争，关于革命的建设与破坏的关系，对旧社会的韧性战斗，战线的扩大和人才的造就，以及共同革命目标的确立等见解，无疑都具有方向性意义，所以便成了“左联”的，乃至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指南。当然，这也是他自己首先实践的言行准则。

无产阶级文学，乃无产阶级“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并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这斗争，在民主革命的三十年代，集中表现为推翻国民党代表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破坏”即根本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黑暗社会，以建设社会主

义的光明“将来”。离开无产阶级“最高的政治斗争”及其重要手段的革命武装斗争，社会主义便将永远是“沙笼”式的空谈。因此，在文学战线上，“坚决，持久不断”地打击敌人和教育人民，也理所当然成为“左联”最基本的历史使命。鲁迅以身作则，主要从政治揭露、社会批判和文艺斗争三大方面，卓越地担当并完成了这样的历史使命。

二

如果说鲁迅在上海，对敌斗争的重点最初是继续揭露反革命政变和反共屠杀政策，那末“左联”成立后随着国民党统治的相对“稳定”，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随着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斗争的蓬勃兴起，他也就相应地进而发展为揭露国民党的军事与文化“围剿”和媚外投降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殖民政策了。这方面的杂文很多，其中一类，例如《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通过哀悼牺牲的几位“左联”烈士，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治的黑暗和帝国主义走狗的凶残，同时指出它们在“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说”的人民大众包围之中的虚弱本质，激励“左联”战友和广大读者沿着烈士的血迹奋进；《“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主题似乎只批判一个反动的御用文学派别，但实际上通过解剖其毫无艺术性可言的“作品”，展示他们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所“保护，养育”，是国民党“流氓政治”的产物，只有“为王前驱”的反共叫嚣而谈不上“文学”；他们和主子的“沉滞狼劣和腐烂的运命”，必然被“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涛”洗刷和荡涤；此外，《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和《沉滓的泛起》等篇亦然，都属主题有关文艺，但政治意义和社会效果远超出文艺领域。另一类，主题全然与文艺无关，例如《“友邦惊诧”论》、《电的利弊》和《逃的辩护》、《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天上地下》、

《中国人的生命圈》、《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等等，和针对蒋介石所谓“安内始能攘外”谬说的那一组名篇，则都是最典型的杂感式政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国际帝国主义操纵下“国联”的帮凶嘴脸，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葬送国土和出卖主权，对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和对白区革命者的残酷迫害，人民群众的水深火热和中国社会的暗无天日，都真实地、形象地、深刻地被概括或勾划了出来。运用杂文形式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进行政治揭露，具有这样巨大说服力和强烈感染力的政治揭露，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在前期鲁迅的杂文里，也是不曾有过的。

同样，“左联”时期鲁迅的社会批判，也较过去更为深刻和广泛。其中有一类，是与政治揭露密切联系着的，如批判蒋介石之效法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批判蒋介石在“礼义廉耻”的幌子下鼓吹虚伪的“新生活运动”；指出凡此种种，均属愚民政策和精神统治的“牧民”手段，目的在于“治民众”。另一类批判的内容，虽非直接出自国民党的政治口号，而是现成的“古训”，如“安贫乐道”的所谓格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所谓谚语，一经鲁迅分析，其禁锢人们思想和阻遏改革进取的危害性，其对于人们社会关系消极影响的严重性，便昭然若揭了。再一类，是批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日常生活现象，包括弱者和女性所受“经济的压迫”、“礼教的制裁”；低级庸俗的黄色新闻，和杀人不见血的“谣言世家”；倚靠权门凌蔑百姓，帮凶又帮闲的“二丑艺术”；流氓政治的基础“吃白相饭”；反映“奴才品行”的“揩油”手段，以及“高等华人”也不能免的“西崽相”。还有一类，表现似乎只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有些慷慨家说，世界上只有水和空气给与穷人。此说其实是不确的”，“卖心卖力的被一天关到夜，他就晒不着日光，吸不到好空气，装不起自来水的，也喝不到干净水”，“一到这里，就不免要说征服自然了，但现在谈不

到，‘带住’可也”^①；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反映社会矛盾，而反动统治的旧社会是“谈不到”征服自然的。

统治阶级辩护说，“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有”，就好比“从来如此”乃封建主义卫道士的遁词一样，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外国也有”亦属高等华人辩护没落的遁词：“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然而，当着面对外国人的指摘，说中国人不讲公德，“只知自利，爱金钱”的时候，却“没法辩解”了。不错，达官贵人们“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亦许还可强解为“外国也有的”，但是，为什么总不愿借鉴别人的先进处呢？譬如“哥伦布与爱迪生”。原来正象鲁迅所说，因为他们是“高等华人”，完全不同于人民，即使中国落后到了亡国的地步也无所谓，反正“在外国买有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所以“君不闻迦勒底与马其顿乎？”亡国，“外国也有的！”^②鲁迅的批判锋芒指向黑暗社会的每一角落，指向腐朽势力的每一阶层，从“高等华人”直到“妓院主人”，——他曾经援引一则报纸广告写道：“妓院主人也可以悬赏拿人，至少，可以使我们知道所住的是怎样的国度，或不知道是怎样的国度者也。”^③的确，“妓院主人”之流，正是旧社会中旧势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一九二五年，鲁迅号召过青年“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这可诅咒的时代”。如今，时代虽仍然是可诅咒或更加可诅咒的，但革命却走在时代的前头并大大地发展了，加之他本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确立，所以三十年代在上海，在揭露反动与批判黑暗同时，他对革命力量和光明前景也不时发出热烈的称颂与歌赞。“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

① 鲁迅：《踢》、《靠天吃饭》。

② 鲁迅：《外国也有》。

③ 鲁迅：《〈剪报一斑〉拾遗》。